

“以”字处置式研究

徐正考 杨朋飞*

【摘要】“以”字处置式形成于先秦时期,它的形成经历了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三个阶段。在连动式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中,当“以”表示“使用”义时,“N₁”可以理解为“V+N₂”凭借的工具,因此“以”逐渐语法化为工具介词。在工具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中,“以_{介词}+N₁”可以看做是对“N₁”的强调,由此“以”可以理解为焦点标记,在双宾语句式的影响下,形成“以”字处置式。由于“以”字处置式是由“以”字工具式演变而来,因此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影响了“以”字处置式的发展,从而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

【关键词】“以”字处置式;语义;句式

一、引言

处置式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法现象,自1943年王力先生提出处置式的概念以后,^①学界对这一句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但是在处置式的形成时间及来源问题上,学界仍存在较大的分歧。关于处置式的形成时间,学界的意见可以分为两类:一是先秦说,二是唐代说。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点在于是否承认“以”字式属于处置式。持赞同意见的学者,认为汉语处置式在先秦已经产生;持反对意见的学者,认为“将/把”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置式,汉语处置式产生于唐代。因此,关于处置式的来源,分为两种情况:一是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来源,二是“将/把”处置式的来源。之所以提及后者,是因为我们认为两种处置式之间存在历时替换关系。

(一)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来源

关于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来源,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,一是认为“以”字处置式的词序似是上承远古和上古前期的宾语前置而来,在前置宾语前加一个介词“以”为语法标志,就产生了“以”字句处置式。^②二是认为“以”字处置式来源于双宾语句式,如徐志林推测“以”字式是从双宾语句式衍生出来

*徐正考,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130012;杨朋飞,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130012。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”(13&ZD133)的资助成果。

①王力:《中国现代语法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5年,第87页。

②陈初生:《早期处置式略论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3年第3期。

的,只不过为了强调直接宾语,才通过介词“以”将其提到动词的前面。^①三是认为“以”字处置式是由“以”字工具式演变而来,代表学者如龙国富^②、吴福祥^③、蒋绍愚^④等。

(二)“将/把”处置式的来源

关于“将/把”处置式的来源,学界主要有四种意见。一是认为在连动式“将/把_{动词}+N₁+V+N₂”中,由于动词“将/把”语法化,重新分析为介词,从而在唐代形成“将/把”处置式,代表学者如祝敏彻^⑤、贝罗贝^⑥、王力^⑦等。二是认为“将/把”处置式来源于先秦时期具有提宾功能的“以”字式,其形成是对“以”的介词替换,代表学者如P.A.Bennett^⑧、陈初生^⑨、徐志林^⑩等。三是认为不同类型的“将/把”处置式来源不同,代表学者如叶友文^⑪、梅祖麟^⑫等。叶友文将隋唐时期的“将/把”处置式分为“纯处置”“处置给”“处置到”三类,认为“纯处置”在唐代伴随介词“将/把”用于诗句而产生,“处置给”“处置到”分别来源于隋唐以前的“以”字句和“於/于”字句。^⑬梅祖麟也将处置式分为三类,分别是:

(甲)双宾语结构:V_B+O₁+V(+于/与)+O₂

(1)处置(给):把O₁给O₂

(2)处置(作):把O₁当作O₂

(3)处置(到):把O₁放到或放在某处

(乙)动词前后带其他成分

(1)动词前带其他成分:V_B+O+X+V

(2)动词后带其他成分:V_B+O+V+Y

(丙)单纯动词居末位:V_B+O+V

梅祖麟认为(甲)型处置式来源于先秦两汉具有提宾功能的“以”字结构,^⑭(乙)型处置式是由受事主语句加上介词“将/把”形成,(丙)型处置式是由连动式发展而来。^⑮四是认为“将/把”处置式的不同类型,是句式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,代表学者如冯春田^⑯、龙国富^⑰、吴福祥^⑱等。如吴福祥认为“将/把”处置式的产生与演变经历了“连动式>工具式>广义处置式>狭义处置式>致使义处置式”这样的连续的发展过程,“以”“将”之间的词汇兴替开始于隋代,在晚唐五代完成。^⑲其中,吴文的“广义处置式”对应梅文的(甲)型处置式,“狭义处置式”对应梅文的(乙)(丙)型处置式。

总的看来,学者的意见主要分歧在两点:一是先秦时期的“以”字式是否可以看做处置式;二是不同类型的处置式的形成是多源的还是连续的。这两点分歧关系到对处置式产生时间形成过程的认识。

①徐志林:《汉语双宾句式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,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3年,第170页。

②龙国富:《从“以/将”的语义演变看汉语处置式的语法化链》,《汉语史学报》2009年,第38页。

③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5年,第383页。

④蒋绍愚: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年,第270页。

⑤祝敏彻:《论初期处置式》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:《语言学论丛》,上海:新知识出版社,1957年,第17—33页。

⑥贝罗贝:《早期“把”字句的几个问题》,《语文研究》1989年第1期。

⑦王力:《汉语史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4年,第474—483页。

⑧蒋绍愚: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,第248页。

⑨陈初生:《早期处置式略论》,《中国语文》1983年第3期。

⑩徐志林:《汉语双宾句式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,第174页。

⑪叶友文:《隋唐处置式内在渊源分析》,《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》1988年第1期。

⑫梅祖麟:《唐宋处置式的来源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0年第3期。

⑬叶友文:《隋唐处置式内在渊源分析》,《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》1988年第1期。

⑭“以”字结构即是指“以”字式,两者只是名称的不同。

⑮梅祖麟:《唐宋处置式的来源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0年第3期。

⑯冯春田: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》,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555—581页。

⑰龙国富:《从“以/将”的语义演变看汉语处置式的语法化链》,第38页。

⑱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3页。

⑲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8—401页。

关于第一点分歧,我们认为,“以”字式属于处置式,经历了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的形成过程,它的形成受到双宾语句式的影响。所以“以”字处置式具备双宾语句式的特点。关于第二点分歧,我们认为,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是由连动式“将/把_{动词}+N₁+V+N₂”语法化形成,形成以后逐渐替换了“以”字处置式,从而促使处置式的发展,即不同类型的处置式的形成是连续的。

因此,我们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,一是双宾语句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形成的影响,二是“将/把”处置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替换。

二、动词“以”的语法化与双宾语句式

在甲骨文中,“以”的字形是“𠄎”,裘锡圭指出,“以”有时当“携带”“带领”讲,^①例如:

(1) 丁未卜,贞:惟亚以众人步?十二月。(《甲骨文合集》,35)

郭锡良指出,西周金文中“以”字单独作谓语已经非常少,马承源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》选有西周青铜器511件,“以”字出现64次,单独作谓语的仅1次,在连动结构中,一般是用作“带领”义,^②如:

(2) 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。(《小臣谏簋》)

郭锡良认为,“以殷八师”可以是带领殷的八支部队,也可以理解为使用殷的八支部队,^③动词“以”逐渐由“率领”义引申出“使用”义。吴福祥也指出,降至两周时期,“以”用为动词时主要的词义是“使用”而非“率领”,^④例如:

(3) 汝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陵。(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·不其簋盖》)

在春秋时期,动词“以”可以理解为“使用”义,例如:

(4) 我辞礼也,彼则以之。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)

当表“使用”义的动词“以”与其他动词共同出现构成连动式时,表示“使用A+动作B”的语义,由于有两个动词,而后一动词的意义较为重要,洛德认为意义上不大重要的成分常常变得在句法上也不太重要,^⑤因此动词“以”存在语法化的倾向,这时“以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,例如:

(5) 醒,以戈逐子犯。(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)

例(5)中的“以”既可以理解为动词,表示“使用_{动词}戈+逐_{2价}子犯”的意义,也可以理解为工具介词,表示“用_{介词}戈+逐_{2价}子犯”的意义。这体现了“以”由动词演变为介词的语法化过程。因此当“以”理解为工具介词时,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句式便重新分析为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句式,“N₁”由动词“以”的受事宾语可以理解为动词“V”的工具宾语,即“N₁”“N₂”都可以看做“V”的宾语。在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句式中,“以_{介词}+N₁”和“V+N₂”由连动式中的并列关系变为偏正关系,“N₁”表示动作“V+N₂”凭借的工具,“以_{介词}+N₁”具有强调意味,如例(5)强调“‘逐子犯’的工具是兵器‘戈’”,因此介词“以”可以看做焦点标记,表示对“N₁”的强调。

在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句式中,由于“N₁”“N₂”可以看做“V”的两个宾语,因此这一句式 and 双宾语句式具有相似性,分别为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和“V+N_间+N_直”,即“V”可以连接两个名词性成分。由于“以”字可以看做焦点标记,表示对其后名词性成分的强调,因此在双宾语句式中,当需要对直接宾语进行强调时,可以使用介词“以”提宾,例如:

(6) 及河,子犯以璧授公子。(《左传·僖公二十四年》)

①裘锡圭:《说“以”》,裘锡圭:《古文字论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2年,第106页。

②郭锡良:《介词“以”的起源和发展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1998年第1期。

③郭锡良:《介词“以”的起源和发展》。

④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3页。

⑤蒋绍愚: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,第147页。

(7) 秦亦不以城予赵。(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)

上两例的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句式在同时期分别有双宾语句式与之对应,例如:

(8) 子犯授公子载璧。(《国语·晋语》)

(9) 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。(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)

例(8)(9)中的“璧”“城”是三价动词“授”“予”的受事宾语,由于双宾语句式的影响,“以_{介词}+N₁+V_{2价}+N₂”句式可以发展为“以_{介词}+N₁+V_{3价}+N₂”句式,焦点标记“以”由工具介词变为处置介词,徐志林也指出,从产生时间上来说,双宾语句式早于“以”字式。^①因此例(6)(7)可以看做是由双宾语句式转化形成,转化的动因是为了对直接宾语进行强调,因此用焦点标记“以”字进行提宾。

总的看来,在连动式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中,由于“以”的语法化,形成工具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,介词“以”成为焦点标记,因此可以对双宾语句式中的直接宾语进行强调,这体现了“以”的语法化对双宾语句式的影响。同时,在双宾语句式中,由于介词“以”是焦点标记,可以对受事宾语进行提宾强调,“以”逐渐由工具介词向处置介词过渡,这体现了双宾语句式对“以”的影响。

三、双宾语句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的影响

双宾语句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的处置式形成时间不同。梅祖麟指出,先秦已有用“以”字的处置(给)式和处置(作)式,但处置(到)式最早是在《史记》中出现,^②例如:

(10) 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。(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)

我们认为,处置式这三种类型的形成时间和双宾语句式有关,由于“以”是焦点标记,可以对双宾语句式进行提宾强调,因此“以”字处置式受到双宾语句式的影响,具有双宾语句式的特点,由于双宾语句式的历时不同,不同类型的处置式形成时间不同。需要指出的是,处置(作)式的形成与介词“以”的性质有关,当“以”成为处置介词后,工具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(为)+N₂”可以理解为处置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(为)+N₂”,体现了双宾语句式对处置(作)式的间接影响。

(一) 处置(给)式的形成

张伯江指出,典型双及物式的特征为施事者有意地把受事转移给接受者,^③张文所指的双及物式即是双宾语句式。徐志林进一步指出,双宾结构不是单一语义核心,而是具有双重语义核心的句法结构,即“给予”义和“处置”义。^④例如:

(11) 言终,魏绛至,授仆人书,将伏剑。(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)

(12) 三公问夫子政一也,夫子对之不同,何也?(《韩非子·难三》)

例(11)可以理解为“把‘书’转移给‘仆人’”,例(12)可以理解为“把‘政’转移给‘夫子’”,“问”是言语动词,没有[+给予]的语义特征,这可以看做给予方式“V”的隐喻。^⑤当焦点标记“以”对“N₁”进行强调时,上两例可以分别转化为“以书授仆人”“以政问夫子”,表示“处置(给)”的语义,体现了处置(给)式和双宾语句式之间的联系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“V+N_间+N_直”句式中,当“V”具有[+给予]的语义特征时,“以_{介词}+N_直+V+N_间”凸显“给予”义,如例(11),当“V”不具有[+给予]的语义特征时,“以_{介词}+N_直+V+N_间”凸显“处置”义,如例(12)。

①徐志林:《汉语双宾句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,第170页。

②梅祖麟:《唐宋处置式的来源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0年第3期。

③张伯江:《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9年第3期。

④徐志林:《汉语双宾句的历史发展及相关问题研究》,第150页。

⑤张伯江:《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》,《中国语文》1999年第3期。

总的看来,焦点标记“以”对双宾语句式中的直接宾语进行强调时,双宾语句式“ $V_{3价}+N_{间}+N_{直}$ ”变为“以_{介词}+ $N_{直}+V_{3价}+N_{间}$ ”,由于双宾语句式表示“通过‘V’致使‘ $N_{间}$ ’收到‘ $N_{直}$ ’”,因此“以_{介词}+ $N_{直}+V_{3价}+N_{间}$ ”句式表示“将‘ $N_{直}$ ’给‘ $N_{间}$ ’”,体现了“V”对“ $N_{直}$ ”的处置义,从而“以_{介词}+ $N_{直}+V+N_{间}$ ”句式具有“处置(给)”的语义。

(二) 处置(作)式的形成

在“以_{介词}+ N_1+V+N_2 ”句式中,“以”可以表示“使用”的意义,“以”和不同类型的“V”共现时,“以_{介词}+ N_1+V+N_2 ”句式的语义也就不同。当“V”在句式中具有[+给予]的语义特征时,“以_{介词}+ N_1+V+N_2 ”句式义表示“有意地给予性转移”,如上例分析的处置(给)式,当“V”在句式中具有[+作为]的语义特征时,“以_{介词}+ N_1+V+N_2 ”句式义表示“主观上的关系认定”,例如:

(13) 必以仲几为戮。(《左传·定公元年》)

(14)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。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

在例(13)中,“以”可以有两种理解,一是理解为表工具的介词,表示“用”的意义,即“用—作为”;二是理解为表处置的介词,表示“把”的意义,即“把—作为”。在例(14)中,“以”只能理解为表处置的介词,表示“把‘仲子’作为‘巨擘’”。上文我们指出,在“以_{介词}+ N_1+V+N_2 ”句式中,由于受到双宾语句式的影响,“以”由工具介词发展成为处置介词,因此“以_{介词}+ $N_1+V(为)+N_2$ ”句式的语义可以由“用 N_1 作为 N_2 ”理解为“把 N_1 作为 N_2 ”,从而形成“处置(作)”式,如例(14)。处置(给)式和处置(作)式起源于同一个句式“以_{动词}+ N_1+V+N_2 ”,但是由于动词类型的不同,导致两者句式义的不同,体现了动词类型对句式义的影响。

(三) 处置(到)式的形成

张美兰指出,上古汉语中动词后带两个名词性成分的结构按照名词的语序分为“ $V+O_1+O_2$ ”和“ $V+O_2+O_1$ ”两种。^①“ O_1 ”指的是间接宾语,“ O_2 ”指的是直接宾语。由于“ $V+N_{直}+N_{间}$ ”句式数量很少,主要使用“ $V+N_{直}+于+N_{间}$ ”句式,因此我们认为处置(给)式和处置(作)式的形成是受到“ $V+N_{间}+N_{直}$ ”句式影响,处置(到)式的形成是受到“ $V+N_{直}+于+N_{间}$ ”句式影响,这是由于句式义和语义焦点不同,“ $V+N_{间}+N_{直}$ ”句式表示“通过‘V’致使‘ $N_{间}$ ’收到‘ $N_{直}$ ’”,“ $V+N_{直}+于+N_{间}$ ”句式义表示“通过‘V’致使‘ $N_{直}$ ’移向‘ $N_{间}$ ’”,刘宝霞指出前者焦点是转移的客体,后者的焦点则为接受者。^②例如:

(15)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。(《左传·僖公九年》)

(16)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。(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)

例(15)的语义为“通过‘赐’致使‘齐侯’收到‘胙’”,语义焦点是“胙”。例(16)的语义为“通过‘献’致使‘鼋’移向‘郑灵公’”,语义焦点是“郑灵公”,用介词“于”标记。因此,当表达“致使—收到”义时,使用“ $V+N_{间}+N_{直}$ ”句式;当表达“致使—移动”义时,使用“ $V+N_{直}+于+N_{间}$ ”句式。由于介词“以”是焦点标记,因此当强调句式中的直接宾语时,可以使用“以”字提宾,例如:

(17) 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。(《国语·周语中》)

(18) 王以戎难告于齐。(《左传·僖公十六年》)

例(17)中的“以_{介词}+ $N_{直}+V+N_{间}$ ”可以看做是“ $V+N_{间}+N_{直}$ ”的变换,焦点标记“以”对“ $N_{直}$ ”进行强调;例(18)中的“以_{介词}+ $N_{直}+V+于+N_{间}$ ”可以看做是“ $V+N_{直}+于+N_{间}$ ”的变换,焦点标记“以”对“ $N_{直}$ ”进行强调。

①张美兰:《汉语双宾语结构句法及其语义的历时研究》,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139页。

②刘宝霞:《上古汉语中与双宾语相关的几种句式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2期。

总的看来,在先秦时期,“以_{介词}+N_直+V+N_间”已经形成“处置(给)”式和“处置(作)”式,而没有形成“处置(到)”式,这是由于表示“处置(到)”义的句式是“V+N_直+于+N_间”,“V+N_直+于+N_间”句式的语义焦点为间接宾语“N_间”,使用焦点标记“以”强调直接宾语“N_直”时,形成“以_{介词}+N_直+V+于+N_间”句式,因此“以_{介词}+N_直+V+N_间”的“处置(到)”式在先秦没有形成。到了西汉时期,介词“于”逐渐开始消失,柳士镇^①、邵永海^②、李崇兴^③等学者都对这一语法现象进行过探讨,方平权也指出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记述同一历史事实的例句,《左传》使用介词“于”,而《史记》不用,^④例如:

(19)韩宣子问于叔向曰……(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)

(20)韩宣子问叔向曰……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

上例(20)可以看做是例(19)的省略形式。董秀芳指出当一个本来不能充当常规宾语的名词性成分被强调时,往往会被置于适于表达焦点成分的动词后宾语的位置,久而久之,某些必须用“于/於”引进的名词性成分就可以不用“于/於”引进了。这些成分就由语用性的宾语变成了句法上的宾语。^⑤因此,先秦时期的“V+于+N”形式,在西汉时期可以省略介词“于”,形成“V+N”形式。方平权也认为不少《左传》中限用“于/於”字结构的动词,在《史记》中都进入双宾语结构,^⑥因此,“V+N_直+于+N_间”句式可以表达为“V+N_直+N_间”句式,“V+N_直+N_间”句式开始大量出现,例如:

(21)及七年后还政成王。(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)

(22)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。(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)

同时,先秦的“以_{介词}+ (N_直) +V+于+N_间”句式,在西汉可以变为“以_{介词}+ (N_直) +V+N_间”句式,例如:

(23)故出其君,以说于晋。(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)

(24)故出其君,以说晋。(《史记·晋世家》)

因此,西汉时期介词“于”的消失,先秦表“处置(到)”义的句式由“V+N_直+于+N_间”变为“V+N_直+N_间”,形式上失去了焦点标记“于”,当强调直接宾语时,形成表“处置(到)”义的“以_{介词}+N_直+V+N_间”。

四、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替换

“以”字处置式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,而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形成于唐代。吴福祥通过分析魏晋六朝和隋代处置式中介词“以”“将”的使用情况,认为在广义处置式中,“以”“将”之间的词汇兴替隋代已经开始,大约在晚唐五代完成。^⑦我们认为,“将/把”对“以”的替换动因是“以”字式的多义性。由于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表义不够明确,限制了处置式的进一步发展,因此“以”字处置式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,要求新形式的出现。同时由于“将/把_{动词}+N₁+V+N₂”和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具有相似性,两者最初都是连动式,具有相同的语法化环境,因此“以”字式的多义性为动词“将/把”的语法化提供了可能,在“将/把”语法化为介词,形成广义处置式后,逐渐替换了“以”字处置式。

(一)“以”字式的多义性

“以”字式的多义性体现在“以”既可以是表工具的介词,也可以是表处置的介词,例如:

①柳士镇:《询问动词“问”字宾语形式的历史考察》,《南京大学学报》(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)1989年第6期。

②邵永海:《从〈左传〉和〈史记〉看上古汉语的双宾语结构及其发展》,严家炎、袁行霈编:《缀玉集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0年,第550—575页。

③李崇兴:《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》,胡竹安、杨耐思、蒋绍愚编:《近代汉语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2年,第243页。

④方平权:《关于介词“于”由先秦到汉发展变化的两种结论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2000年第2期。

⑤董秀芳:《古汉语中动名之间“于/於”的功能再认识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2006年第2期。

⑥方平权:《关于介词“于”由先秦到汉发展变化的两种结论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2000年第2期。

⑦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6—387页。

(25) 醒,以戈逐子犯。(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)

(26)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(《论语·先进》)

(27) 庄公通焉,骤如崔氏,以崔子之冠赐人。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)

(28)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

例(25)中的“以”可以理解为工具介词,语义为“用戈逐子犯”,例(26)(27)中的“以”可理解为工具介词,语义为“用其兄之子妻之”^①“用崔子之冠赐人”,也可理解为处置介词,语义为“把其兄之子妻之”“把崔子之冠赐人”。例(28)中的“以”可以理解为处置介词,语义为“把天下与人”。因此,从例(25)和例(28)看,在不同的句子里,介词“以”可以有两种理解,或理解为工具介词,或理解为处置介词。从例(26)和例(27)看,在同一个句子里,介词“以”可以有两种理解,既可以理解为工具介词,也可以理解为处置介词。这是由于处置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经历了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的连续发展过程,因此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表义不够明确,可以存在不同的理解,从而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

(二) 介词“将/把”对“以”的替换过程

上文我们指出,由于“以”字式的多义性,从而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,但是关于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过程,学界存在不同意见。祝敏彻^②、刘子瑜^③等学者认为“将/把_{动词}+N₁+V+N₂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过程为“连动式—处置式”,吴福祥认为它的形成过程为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。^④蒋绍愚指出,研究历史语法必须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问题,认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由“将/把”字工具式演变而来,在时间上遇到了困难。^⑤因此,我们认为,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是由连动式直接语法化形成,之所以存在“将/把”工具式,是“将/把”对“以”替换的结果,例如:

(29) 奴遂以斧斫我背,将帽塞口。(颜之推《还冤记》)

吴福祥指出,例(29)中的“将帽塞口”,既可以分析为工具式,也可以分析为广义处置式。^⑥我们认为上例中“以斧”和“将帽”对举,“斫我背”和“塞口”对举,由于“以斧”属于工具式,因此将“将帽塞口”看做工具式更符合文意。处置介词“将”之所以可以介引工具,是由于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在替换“以”字处置式的过程中,沾染了“以”字工具式的语义特点,体现了介词替换对“将/把”的影响。关于两者之间的替换,可以用历史文献证明,例如:

1. 处置(给)式的介词替换

(30)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(《孟子·万章上》)

(31) 近有邻王废其国君,以大都城持施众僧。(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)

(32) 善知识不将佛菩提法与人。(《神会语录·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》)

(33) 莫将天人(女)施沙门,休把娇姿与菩萨。(《敦煌变文集》第631页)

后三例属于同一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“将/把”和“以”的共存阶段,例(32)(33)和例(30)属于不同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处置式中介词的历时变化。

2. 处置(作)式的介词替换

① “其兄之子”可以理解为“用”的工具,例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:“单于既得翁侯,以为自次王,用其姊妻之,与谋汉。”

② 祝敏彻:《论初期处置式》,第17—33页。

③ 刘子瑜:《再论唐宋处置式的来源》,北京大学中文系《语言学论丛》编委会:《语言学论丛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2年,第206—231页。

④ 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5—388页。

⑤ 蒋绍愚:《近代汉语研究概要》,第273页。

⑥ 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5页。

- (34)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。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
- (35) 人以身为本,本以心为柄。(寒山《人以身为本》)
- (36)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,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。(李白《战城南》)
- (37) 能将佛事为心,不把世缘作务。(《敦煌变文集》第509页)
- (38) 相劝事须行孝顺,莫将恩德看为闲。(《敦煌变文集》第506页)

后四例属于同一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“将/把”和“以”的共存阶段,例(37)(38)和例(34)属于不同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处置式中介词的历时变化。

3. 处置(到)式的介词替换

- (39) 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。(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)
- (40) 如来乃以火龙盛置钵中,清旦持示外道门人。(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八)
- (41) 每把金襴安膝上,更将银缕挂肩头。(《敦煌变文集》第506页)

后两例属于同一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“将/把”和“以”的共存阶段,例(41)和例(39)属于不同时期的文献,体现了处置式中介词的历时变化。同时文献再如:

- (42) 以百钱挂杖头。(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)
- (43) 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床前。(《古小说钩沉·幽明录》)

例(42)表示“把百钱放在杖头”,例(43)表示“把二百钱放在床前”,同样的语义使用了不同的介词,说明了“以”和“将”语义相同,两者之间存在可替换性。

同一句式表达相同的语义,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了不同的介词,在先秦时期只能使用介词“以”表示处置义,而在唐代主要使用介词“将/把”表示处置义,这可以看做是介词的替换。吴福祥也指出,魏晋六朝处置式出现的介词主要是“以”,“将”字少见;在隋代,“以”字逐渐少见,“将”字开始多起来。^①这体现了介词“将/把”对“以”的替换,即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对“以”字处置式的替换。

总的来看,“以”字处置式经历了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的过程。在工具式中,“以”的语法化不够彻底,在双宾语句式影响下形成处置式,因此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既可以表工具义,也可以表处置义,限制了“以”字处置式的发展,从而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直接来源于连动式,“将/把”的语法化较为彻底,在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形成之后,逐渐替换了“以”字处置式。

五、结论

以上我们主要讨论了两点:一是“以”字处置式与双宾语句式的关系;二是“以”字处置式和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关系。在先秦时期,动词“以”具有表示“使用”的意义,因此在连动式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中,“以”可语法化为工具介词,连动式“以_{动词}+N₁+V+N₂”可以重新分析为工具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,即连动式为动词“以”的语法化提供了句法环境。在工具式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中,“N₁”作为“V+N₂”的工具,用介词“以”介引,可以看做是对工具“N₁”的强调,因此介词“以”可以看做是焦点标记,即工具式为介词“以”演变成焦点标记提供句法环境。由于“以_{介词}+N₁+V+N₂”和双宾语“V+N₁+N₂”具有相似性,可以用焦点标记“以”对双宾语句式中的直接宾语进行提宾强调。因此,“以”字式受到双宾语句式的影响,这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焦点标记“以”对双宾语句式中的受事宾语强调时,“以+工具”变为“以+受事”,“以”由工具介词演变为处置介词,形成“以”字处置式。二是由于

^①吴福祥:《近代汉语语法》,第386页。

双宾语句式的历时不同,因此“以”字处置式的不同类型形成时间不同。由于“以”字处置式的形成经历了“连动式—工具式—处置式”三个阶段,介词“以”既可理解为工具介词,也可理解为处置介词,因此“以”字式具有多义性,限制了处置式的发展,从而为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当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形成以后,逐渐替换了“以”字处置式。同时由于“将/把”广义处置式直接由连动式发展而来,没有经历过工具式,因此“将/把”的语法化较为彻底,成为处置介词,从而促进了处置式的发展,形成狭义处置式和致使义处置式。

(责任编辑:高峰)

On the Mandarin Chines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

XU Zheng-kao, YANG Peng-fei

Abstract: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以 in Mandarin Chinese was formed in the pre-Qin period. Its formation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: i.e. from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o instrumental construction to disposal construction. In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“ $yi_{verb}+N_1+V+N_2$ ”, when the verb *yi* means “use”, N_1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instrument involved in the action indicated by “ $V+N_2$ ”, and then *yi* was gradually grammaticalized from a verb into an instrumental preposition. In the instrumental construction “ $yi_{pre}+N_1+V+N_2$ ”, *yi* can be regarded as a focus marker of N_1 .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, the instrument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 as a focus marker then developed into a disposal construction. Because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volving *yi* evolved from the instrument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, the meaning of *yi* is ambiguous in that it can be either an instrumental preposition or a disposal preposition. This ambiguit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, thus making it possible to be replaced by the generalized disposal constructions involving *jiang*将 and *ba*把.

Key words: disposal construction with *yi*; meaning; construction